

夏济安著
夏志清校注

尽古典之能事 浪漫得淋漓尽致

夏济安日记



107693

夏
济
安
日
记

尽古典之能事
浪漫得淋漓尽致



夏济安著
夏志清校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济安日记 / 夏济安著;夏志清校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ISBN 978-7-02-008666-5

I. ①夏… II. ①夏… ②夏… III. ①日记—作品集—
中国—现代 IV. ①I2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9975 号

本书由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责任编辑:杜丽
特约策划:陶媛媛
装帧设计:Lika

夏济安日记

夏济安 著 夏志清 校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48 千字 开本 72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8

2011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8666-5

定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2006 年版前言]

真诚痴情面的明证/夏志清 1

[1974 年版序论]

可当恋爱史读/夏志清 3

[日记本文]

一九四六年元月日记 23

一九四六年二月日记 43

一九四六年三月日记 71

一九四六年四月日记 109

一九四六年五月日记 129

一九四六年六月日记 153

一九四六年七月日记 173

一九四六年八月日记 199

一九四六年九月日记 221

再说几句/夏志清 237

[特载]

夏济安日记(部分手稿) 242

夏济安英文日记 247

济安师致李彦最后一封信(附原函草稿影本) 259

[附章]

致济安书/夏志清 267

追念济安老师/董同珪 273

真诚痴情面的明证

写在《夏济安日记》新版之前

夏志清

一九四六年所写的《夏济安日记》最主要的情节，即是济安哥于该年正月至九月间日夜想念一位女生的经过。当年我不知听了何人的建议，把这位女主角的中英文姓名全都勾销，在《日记》里只留下 R. E. 这两个字母来代表她。一九四六年她才二十岁，假如她尚在人间，到了今天也是八十岁的老人了。在她的生命史上，上过她一年课的夏老师可能一点也不重要，但在济安哥的生命史上，她是个极重要的人物，他于一九四六年所记的日记就是她具有重要性的明证，也更让我们看到了夏济安真诚痴情面的明证。在这本新版《夏济安日记》里，我已勾销了 R. E. 这个假名，因为济安师在日记里通常称她为李彦 L. Y.，难得在一段英文日记里也称她为 Lee Yen，但同她通信时，却很有礼貌地称她为“李小姐”。

四月二十七日星期六那天的日记如下：“写了一天信，长达七千字以上。晚饭去践约，竟然就会吵架！我真该死！真想离开昆明了，可是听了朋友的劝告，连夜送道歉信去。”

翌日又送了封道歉信给李彦。五月二日写了封二十页的长信给我。五月三日“午后我大哭一阵。倒不是全为了想念她,我只是后悔。我太对不起她了。”五月四日“一醒来在床上又哭一场。”当晚又开始写信给她,五月六日星期一上午,终于“用了有格稿纸”誊写后递给她。

济安哥一九四六年的日记,原先都抄录在两本日记簿上。我早已注意到有一份五页的信稿夹在第二本日记簿内,是他于五月五日写给“李小姐”的。原信楷书虽写得很端正,但事后他又把此信大加修改,我因之对它未加重视。现在我相信,此信乃五月六日递给李彦那封信的原稿,济安在五月五日日记上自称已“尽古典之能事”,因为上一封长信虽“浪漫得淋漓尽致”,却并未见效。二人后来在北平北大重逢,但有无再通信,待考。此函绝对是济安在昆明期间递给李彦的最后一封信,我在此公布,以飨本书读者。(请见本书第 242—264 页[特载]之《济安师致李彦最后一封信》全文及部分手稿)

二〇〇六年七月十三日·纽约

可当恋爱史读

夏志清

济安哥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去世时,才四十九岁。三月一日我从旧金山飞纽约,带归的遗物中,最珍贵的是济安的两本日记和我自己多年来寄给他的信件。时隔九年,最近又把这两本日记拿出来重读,感动的情形,不下于当年初读,决定把它发表,使济安很多的朋友和读者对他的为人和情感生活有更深入的了解。日记从一九四六年正月一日记到九月二十九日,三十日那天我们兄弟就从上海乘船北上,到北京大学去就职了。船上看的书我至今还记得,是克斯脱勒(Arthur Koestler)的小说 *Darkness At Noon*。二十九日记载极短:“Sunday,晴。看宋奇。听谭富英‘八大锤’。”那时我们兄弟都爱看平剧,谭富英那天下午演王佐“断臂”的绝活,至今还记得。谭富英的儿子谭元寿,近年来一直在唱江青的几出“样板戏”,谭家世传的那些特别“做工”,可以说快要失传了。

第一本日记的扉页上用英文写着“一九四六正月——七月,昆明——重庆——南京——上海。”这下面贴上一帧我和六妹的小照(我下

面的三个弟弟皆夭卒),照片底下,济安录了一首诗:

世界光如水月

身心皎若琉璃

但见冰消涧底

不知春上花枝

——六月六日录慈山诗

扉页的背面录了十九世纪末英国两位诗人的诗句:

Whom wilt thou find to love ignoble thee,

Save Me, save only Me?

—— Francis Thompson, “Hound of Heaven”

Do what thou wilt, thou shalt not so,

Dark Angel! triumph over me:

Lonely unto the Lone I go;

Divine, to the Divinity

—— Lionel Johnson, “The Dark Angel”

汤普林和约翰逊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天狗》和《黑天使》都可说是他们的代表作,《天狗》尤有名。《天狗》两句可直译成“除了我外,只除了我外,你还能找到谁来爱怜卑贱的你?”“我”就是天狗,也就是基督,躲避他的“你”是诗人自己,也可说是人的“灵魂”。约翰逊的“黑天使”,指山顿,也指诗人自我黑暗的一面(约翰逊隐指自己同性恋的罪恶,济安那时可能不知道)。那四句的大意是“不让自己屈服于黑天使,自己灵魂寂寞一部分仍归寂寞,神圣一部分仍归神圣”。从这两节引诗,可看出济安那时宗教意识很浓,但他对基督教、佛教一视同仁,看他的日记,有时会求祷于上帝,有时会去礼拜活佛,而且居然开了头顶,可以把一根草插进去(见三月三日那天的日记)。

同页这两节诗下面贴了一张“学生选习学程单”小纸。填写这张单子的是大一女生李彦,也就是这两本日记的女主角(虽然她出场次数不多),济安那年日夜想望、苦苦单恋的对象。兹将这张小纸抄录如下: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生选习学程单

民国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度

学程: 英文作文	组别: H
教师: 王高祥	学期: 学分: 2
学生: 李彦	学号: 34345
系列: 历史	学组年级: 一

(此联即上课证,经课程股盖章持交教师)

课程 2102—34—30000 注册组课程股(紫色印章)

济安把这张小纸贴在日记上,因为这是他仅有的李彦亲笔手迹。李彦写的几个字,墨色已淡,王高祥的名字写了再用几条横线划掉。想来,H组英文作文本来是派给王高祥教的,一九四五年秋季开学时临时换了济安。根据日记的记载:秋季开学后,济安在课堂上注意到李彦,在十月九日那天,从此倾心,日夜痴想。可惜一九四五年秋季开学后的那段日记,济安没有带出国,我无从见到。

现在复印文件很方便,当时不可能(photostat的设备可能联大没有)。学生的每篇作文,老师批改后即得发还,无法保存,所以济安有一次竟把李彦叙述她生平的那篇作文,全文抄进日记去。李彦看来没有回过济安任何信。既无“情书”、“作文”可留,只好保存这张“上课证”了。

第一本日记正月一日起,至七月十三日,“全录(Xerox)”复印(扉页不在内),两页作一页,共七十四页。济安六月十日从南京乘火车到上海,第二本日记七月十四日起,至九月二十九日,中间缺一页,看样子是济安自己撕掉的。我们因此看不到八月八、九日两天的日记,八月十日的日记也只能看到下半段,此节日记破例是用英文写的,记的是日里见到、梦中想到一位中学生样子的女孩子,济安对她有欲念,而对李彦一无邪心,自感惭愧,所以把那一页撕掉了。这本日记“全录”出来(扉页不在内),共二十四页(七十五页至九十八页)。扉页上用英文写着“一九四六,七月,上海”,并录了两位十九世纪英国诗人的诗句:

Hearts ...

Must or once for all be given,

Or not at all be given.

—— Arthur Hugh Clough

... until we recognise

A grandeur in the beatings of the heart.

—— Wordsworth: *Prelude*

克勒甫是诗人、批评家阿诺德的好友，济安引的他这一小节诗相当出名，意思是说：“人的心要么全盘交出，要么全盘不交。”把心奉献给谁？当然不是上帝，就是自己的爱人。济安要把整个身心奉献给李彦，可惜对方无意接受，所以他时有隐居出世之想；住在上海一段日子，见到一般世俗之人，尽情享乐，自己也想赚一笔大钱，享受一下，把心不交给任何人。他选录克勒甫的诗句，可能用来表示自己心头的矛盾。引自华兹华斯《序曲》首章的一句半则肯定了大自然陶冶性灵之重要。我们年轻时，自然界的形象不断留给我们恐惧瑰奇的感觉，“直待我们体认到了人心跳动之庄穆伟大”，我们才能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

第二本日记簿有好多空页，紧接日记本文，济安抄引了不少诗句和

警句,想来是到北平后记下来的。簿子最后六页则记载了亲友的地址。

日记最后一页对面引了两句艾略特的诗:

Sayeth the Lord:

I have given you power of choice, and you only alternate

Between futile speculation and unconsidered action.

大意是说:“主曰:我给你们有选择的能力,可是你们的生活交替于无聊的沉思和卤莽的行动之间。”济安只有四月二十七日那天初到那里去“践约”,就“吵架”外,没有机会会有什么行动,全本日记充满了 futile speculation,济安选艾略特这段话(引自宗教剧 *The Rock*(《石》),“Sayeth the Lord”三字则系济安自加),我想是有意责备自己的。

济安一向洁身自好,二十岁得了肺病后,如二月二十四日日记所记,更“从修心上用功,力杜邪念。事实上我邪念根本没有什么,只有自制的习惯,使我一切正常的情感都变成很冷淡,惟怕情感一强,影响身体”。七七事变前,父亲把全家送到上海,自己到内地去。我们由一位亲戚的介绍,住在法租界迈尔西爱路的诚德里,租一层三楼住。那位亲戚叫徐祖藩,字季杰,也住在同里。济安比我会交际,常到他家去走走,我也不知他用意何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他去内地后,我无意中找到他的一本日记,记载的都是“诚德里”事件,原来他爱上了徐家表妹家和(一九四六

年的日记上说,他去南京读大学后就一直记日记,可惜我仅见到三本),所以老去串门子。那次“追求”毫无结果。他既不会托母亲去说亲,也不可能带那位中学生的表妹出去玩。此后济安进光华大学,我进沪江,那时上海郊外都被日寇占据,大学都搬进了公共租界、法租界,在办公大楼租两、三层楼面,毫无校园可言。鹿桥《未央歌》里所记载的那种甜甜蜜蜜的校园生活我们都没有享受过,每天上学等于去办公,挤上电车、公共汽车,下了课,再挤上车回家。当然有钱的公子哥儿找女朋友较容易,即使找不到,也可到舞厅去玩舞女。我们兄弟手边没有零用钱,即使有勇气找对象,也没有钱带她上馆子、看电影,因此索性不存此念,专心读书(假如住在校园里,贫富阶级的差别就不可能这样显著,穷学生也可找个女友在月下散步,慢慢也会生出感情来)。济安在光华读书、教书的几年,一直没有女友,要散心就是看电影、逛旧书铺,虽然他交友比我广得多。

一九四五年,济安看中了李彦,第二次堕入情网,陷得更深。他连与异性携手散步的经验也没有,真是毫无办法,不知如何去表达自己的爱意。读他的日记,有好几个月,他不采取任何主动行为,不断地分析自己的心理,为自己增添苦恼。有一天,李彦到济安宿舍来找他了,他大喜若狂,热情涌流,不可收拾,写了长信去倾吐一番,对方毫无准备,可能真吓坏了。事后他在四月三十日那天的日记上分析得很对:“我假如当她是一个普通女子,随便敷衍,不这样紧张,非但绝不会出这种事,爱情只会

与日俱增。”但性格即是命运，济安非普通人，不可能用普通人的方法去取媚对方。根据他自己的心理分析，他 ego 极强，不在乎世俗的快乐和享受，一旦英文练到炉火纯青的阶段，不难一举成名。但他知道 ego 的命令仍是世俗的，他要把整个身心交给李彦，这才是他真情的流露，他灵魂的需要。同时他认为他爱上了李彦，是上帝的意志，是上帝要他从 ego 的小圈子里拯救出来，去体会人生的真谛。

把李彦当神圣看待，这样的追求法，当然“一败涂地”。但济安到北平后，R. E. 虽不在他班上，他们仍见过几次，我在《亡兄济安杂忆》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有一次那位小姐带了一位女同学，到红楼来找济安。她好像有什么紧急事求助于他，济安立即把刚领到的月薪钞票一大叠全数交给了她。在台北时，朋友有困难，济安总爱仗义相助。但在北平时，我们生活很窘迫，每月薪金只够吃豆浆油条、炸酱面和最简便的饭菜，他那次倾囊救急，对方反应如何，我不大清楚。那一次后，我好像一直没有见到她。

李彦带来的那位女同学名叫李珩，也是湖南人，人生得较矮小，肤色较黑，不够漂亮。她自己也患有肺病，深知济安用情之专，极为感动，常来红楼找他。有一次，她还请我们兄弟到她家里吃晚饭，她母亲亲自下厨。

济安从未带她出去玩过，她请他到她家吃饭，显然表示有论婚嫁之意。但济安对她仅保持师生关系，劝她珍惜身体，一直没有作进一步的表示。

另有一位女生杨菁荪，能在作文班上看得出济安对李彦有意思，人真聪明（见二月二十七日日记）。她到北平后，分派在清华，但有一个下午特地来找我哥哥，我们三人还一同上天坛去玩过。她是名教授之女，态度大方，人品也很端庄，我那时劝哥哥追她，他那时还在痴想李彦，哪里肯改换目标？杨小姐后来留学美国，我在耶鲁时期，听柳无忌太太说，她已拿到了博士学位，还没有结婚。当时闻讯，不觉怅然久之。

济安教书卖力，对学生课外指导特别认真，在台大教书时，女生对他有兴趣的也有好几位，可惜他命运乖蹇，人家对他表示好意的，他偏偏看不中。五〇年代初期时苦追一位女生，第三次堕入情网，所受的痛苦，不下于追李彦的那一次。那次恋爱的经过，请参看董同珪《追念济安老师》那篇悼文（附章三）。济安第二次出国后，专心为学，人较前更为旷达，但那年二月遽然逝世，同他在一位美国女孩子身上受到的刺激，不无关系。

哥哥是长子，同父亲不免冲突多一些。二月二十四日那天的日记上写道：“父亲少年时的吃喝嫖赌曾使母亲很不快乐，我为报答母亲，行为力求方正，与父亲绝对相反。”不免对父亲苛评了些。父亲对“吃喝”并不讲究，到堂子里吃花酒，那时在商界是正常行为，父亲陪着人家吃花酒，自己可能没有真正“嫖”过。麻将的确常打，但这也是商界社交方式之一，不能怪他。母亲守居苏州时期，父亲在北平，在上海，不常回家，倒是

真情。抗战期间,父亲在内地,在仰光,母亲有四五年一个人在上海,送儿子进大学,生活的确非常艰苦。但父亲返回上海后,除了一九四六年春季到台北去帮了徐祖藩一阵忙外,一直没离开过家。父母亲之间的感情,在晚年的确是非常深厚的。

一九五五年春季,济安在印第安那大学读了一学期,暑期来纽海文,有好几个晚上同我谈些家里的掌故。据他所知,我们的祖父相当有些才气,可惜早亡,留下祖母一个人把三个孩子领大,的确不容易。二伯父没有好好读过书,后来在上海开了一月当铺,正月二十四日济安所记病故的那位伯父,就是他。我们父亲是老三,在萨镇冰先生主办的商船学堂读过书,可惜家贫,没有毕业,就到社会上去闯了(徐祖藩是父亲商船学堂的同学,由父亲作媒,同夏家别房小姐结了婚)。父亲的长兄或姊姊,我从未见过,想来一定夭亡。他的四妹,归尤家,生了一大堆男孩子,有不少经我父亲提拔才渐渐能在社会上立足。这些表兄弟都留在大陆。

我父亲性情豪放,人太老实,不会做生意,偏偏一生混在商界。他忠心为朋友服务,朋友们都发了财,自己还是很穷。一九四六年回来台北后,他依旧在一家小银行当经理,连一幢弄堂房子都租不起。济安六月回来,看见家里的经济情形一点也没有改善,心里很气,一度想去台湾。但后来还是按照原定计划,北上教书。

抗战胜利后,徐祖藩任命为台北航务管理局局长,父亲见我赋闲在家,托他带我去。十月动身,名为“专员”,其实我航务一窍不通,普通公

务也办不来,还是依我故例,在办公室里读我的书。但书带得不多,加上住在宿舍,两人一间房,晚上无书桌可供我读书,只好到街上去乱跑。那时台北日本情调很重,到处有小咖啡馆,进去坐坐,颇自得其乐。台胞对大陆来的人非常亲善,居然觉得交女友并不十分困难,一改上海时期“单相思”之苦,情形和我哥哥那一年恰恰相反。四月二十七日同李彦“吵架”,日记上不提原由,此事全部经过,却在给我一封二十页的长信详细道及(可惜内容已无从记起)。我看信,连忙回信打气,但身不在旁,也出不了多少主意。这封信济安一直带在身边,故世后复归我所有。

在联大时济安经常来往的有钱学熙、卞之琳、齐良骥、顾寿观诸同事。钱学熙无锡人,想同钱基博、钱宾四两位国学大师都是同族。此人没有读过大学,英文是自修的。他同济安是光华同事,去内地比济安早一、两年。他没有什么著述,不知哪里来的虚名,在联大时想已是副教授,到北大即升为正教授了,可见他人关系弄得很好。他原名“学熹”,后来改为“学熙”,但在我看来,仍是位道学先生,毕竟受宋儒理学的影响太深了。他是听媒妁之言结婚的,后来爱上了他的小姨,乃倡“真爱”(true love)之说,同我哥哥谈话间、书信上不停讲 true love。一九四九年前,济安也劝他南下,他不听。后来他热心“学习”,变得非常前进。

卞之琳是名诗人,翻译家。联大解散后,他隶属南开。我在北大时,他常从天津来北平,找我哥哥谈谈。他多少年来一直苦追一位名门闺秀(沈从文的小姨,写一手好字,也善唱昆曲)。我离开北大后,她同一位研